

## 权力与责任

——为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六十年而作

### ■陈平原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公布的重要转载来源作者，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举足轻重的大学科，我连年排名第一。有人恭喜，说我很厉害。其实不对，那是因为按作者姓氏拼音顺序排列。若按笔画排列，那就是另一番模样了。如今排列方式变化，我因此占了很大的便宜。不过，若小说家阿来参加排名，那就轮不到我打头阵了。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58年，是新中国最早从事人文社会科学文献搜集、筛选、编辑、出版的文献信息服务机构。经过60年的奋斗，书报资料中心已拥有期刊发行、数字出版、学术评价、智库服务等四大业务。不过对我来说，最熟悉且最关注的，还是复印报刊资料。遵循“精选千家报刊，荟萃中华学术”这一理念，其二次文献出版的独特价值，逐渐得到学界的认可。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初衷是保存资料，方便学界；最近二十年，逐渐兼及学术评价乃至引领风气。很多大学将其作为

与《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并列的权威的二次文献机构。

随着网络普及以及数据库迅猛增长，信息储存及传播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与此相适应，人大书报资料中心也在寻求华丽转身。从资料保存到文献检索，再到学术评价，如此三级跳，决定了其办刊宗旨及经营方式必须与时俱进。说白了，复印转载这件事，若从生意角度，早年很赚钱，而今不怎么赚钱，以后很可能变得不赚钱，甚至必须赔钱赚吆喝。最好的效果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能双丰收当然最好，若做不到怎么办？站在企业角度，当然是力保经济效益，那是他们的立身之本；可站在中国人民大学立场，则应该力挺社会效益。因为，不仅对于人大这一所高校，而且对于整个中国学界，学术评价的公正与客观，是至关重要的。

从2001年起，人大资料中心布上一年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量(率)排名，明显是想以此作为评价各大院系系及杂志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前些年，我当北大中文系主任，每年都接到人大书报资料中心寄来的喜报，也都会贴出来，鼓舞鼓

舞士气，虽然不作为奖励标准。那些年，北大中文总是排名第一，但与其他兄弟院校的差距在明显缩小，不知近年状况如何。当初我看总表，有个不太好的印象，那就是人大排名第一的学科太多了。我承认人大文科各院系实力雄厚，论文多被转载是很自然的事。但学界很可能这么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各册主编都是你们的教授，统计转载数量，你们当然很容易第一了。若只是企业行为，爱转载谁就转载谁，旁人无权说三道四；可你想做成评价指标，那就得力求公正。作为主办单位，明知自己的教授学术水平很高，但也必须克制过快增长的速度，否则会毁了公信力的。

选文是一种权力，用得好与不好，关系到整个中国学术的发展前景。学界寄予这么大的期望，若没做好，有负国人重托，是该打屁股的。在为纪念《文学评论》创办六十周年而作的《名刊的责任与困境》中，我谈及：“如果十年后总结，本领域最具创见的文章不是或很少发表在《文学评论》上，那没什么好说的，编辑部及主编都必须检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如今这套资料名声在外，钻营

的人肯定很多，这个时候，必须保持独立判断，少受人情影响。我当然知道，这很难。不能保证野无遗贤，但主观上须力求公正。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很不理想，骂街的人多，但其实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得学会打扫自家门前雪——对于有权力的人或刊来说，更是如此。

具体到编辑事务，就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减少种类，扩大视野。而这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指向一个目标，那就是：建立并巩固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学术性与权威性。

读《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2019产品手册》，最大感觉是分类太细，种数太多——尤其是管理学类和教育学类。早年以量取胜，目的是追求经济效益；而今想转向学术评价，须重新构建学科框架。过于琐碎，选文水平必定不高，因为好文章就是那么多。再说，分科过细，那些跨学科的文章便难以入列，实在有点可惜。从我历年人选文章看，总共被九个分册选录，最多的是“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其次是“高等教育”“社会科学总论”“文化研究”“中国近代史”等。数量不算太多，但交叉选用而不重复，这也很难

得。看完入选目录，怅然若失的是，我好些重要文章没入选。其中有我自己的问题，比如人家只收报纸及有刊号的期刊，而我90年代与朋友合办《学人》，2001—2014年主编《现代中国》，很多得意之作发在这两个学术集刊上，漏收很正常（至于不收学术集刊是否合适，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还有一点，凡题目显豁，能归属某学科的，一般都会入选；而跨学科或另辟蹊径的，则很难被发表。

放大视野，拓宽领地，超越过于琐碎的楚河汉界，不拘一格选文章，那样更能引领学术风气。可这一来，需投入的人力与物力必定增加。这就说到另一个话题，那就是如何真正发挥原本就有的各册学术委员的作用。就我所知，目前是“门虽设而常关”，各册学术委员会基本上属于摆设。单靠一个责任编辑和一两个执行编委，面对诸如“中国古代近代文学”这样的二级学科，众多论文其实是翻阅不过来的。既然如此，何不真正落实各册编委的职责，邀请他们参与选文？这样做，既减少了主办单位的工作量，又杜绝了人大“既当球员又当裁判”的讥讽，岂不一举两得？

## 一场磅礴而清凛的文学之雨

### ■二 湘

那不是在一个雨夜，你在南京，一个你暂时栖息的城市，在市中心的酒店，能听到窗外街道上汽车喇叭大声地鸣叫，偶有救护车尖厉的声音呼啸而来嘎然而止——酒店对面就是鼓楼医院。你翻开了这本《雨》，你之前已经听到很多对于这本书的赞誉，发自内心的赞誉，你也是因为那些赞誉才买了这本书。翻开第一页，你立刻被那样的文字吸引住了，然后你就沉浸在《雨》所描绘的大雨滂沱的热带胶林里无法自拔。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仿佛置身汹涌倾泻连绵不绝的季风雨里，你惊奇极了，这是一部让人震撼且深深着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本书，你是不敢写读后感的，你的任何文字在这本书面前都显得拙劣而庸庸，但是你居然还是动手写了，没有办法的，你被这清凛的文字砸到了，你被这异质的文字蛊惑了，你闻到了经典的气息，你被这浑然天成的文字牵引着写下了这些呓语似的句子。

你仿佛亲历了一场又一场气势磅礴而又清凛淋漓的文字之雨的洗礼，这雨是来自天外的吧，这

雨是来自魔幻世界的吧，这雨里是夹杂着琥珀，玛瑙和水晶的，这雨里还有石头，污泥和腐叶，这雨里有老虎，蜥蜴，和白蚁，这雨里有芭蕉，胶林和红毛丹，那些你不相熟的独独生长在热带的动物和植物。

你首先惊艳的是《雨》的文字。你被这文字营造出来的氤氲迷离的气氛迷住了。那些文字，瑰丽又奇幻，疏离又细腻，繁复又精致，现代又古老，像极了热带的植物，带着遥远的南方雨林的重重迷雾，带着血色，带着虎啸，带着神秘，带着阴暗森林的墨绿和热带胶林的乳白。大雨如注，方生方死，一场场的雨，落了地，变成水，水混合着土，生出了火，火一样的欲望，那是只有长年浸蕴在那样的土地上的人才能写出来的文字，浑然大真，自成一统。但是你同样看到，这又是依凭学养而生出来的文字。这文字是埋伏着千军万马的，这文字里有卡夫卡，有爱伦坡，有博尔赫斯，有拉美的那些大师，有长期的阅读和积累。因而文字准确到位，美丽而苍凉，没有一丝矫揉造作。

在《雨》里，句子是活的，是有生命的，是跳跃的，是变换的，是自由而流畅的，那是来自南方的句子，瑰丽而奇异，像热带的鱼儿一样穿梭，美妙得无与伦比，仿佛从

那一篇，随便从哪一页捡起，你都能看到这些不同凡响又耐人寻味的句子。

然后你一篇一篇地读，你发现了《雨》的结构之美。虽则是一个个短篇，却是互相牵连。名字取得很巧，像绘画作品，《雨》作品一号，《雨》作品二号——《雨》的系列作品，非《雨》系列作品，也和其它篇章一样充盈着同样的气息。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南方之南的热带胶林，出场的人物也不过是那一家人，父亲，母亲，儿子辛，女儿叶，还有他们的亲戚和朋友。一场场的雨，面目全非又似曾相识。这个小家族的一个个走进这浓稠的雨的雨幕，走出来便是另一世了，在这一篇死去的人在另一篇里又活了过来。每一个人在一场场的雨中生来，又在雨中死去。他们似乎什么也没有做，不过就是在一场场大雨里等着生，等着死，又似乎经历了所有的生生死死，但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生和死。没有重复的细节，没有重复的句子，他们的才思似乎是汨汨而来永不会干涸的，而小说里的人物也因此可以无穷尽地轮回复活转世。

每一篇构思都非常巧妙，比如《沙》，前面的故事已经非常精彩了，但还有一个豹尾，你被这个结尾吓到了，那么野蛮，那么出其不意，但是你不得不服服，这才是一个杰出的短篇的结尾，突然一个包袱甩出来，那么有力，那文字里是蕴藏着杀机的。叙述角度也是新颖，很多篇里用的是“你”，其实是“我”，一般小说常里的“我”。比如那篇《归来》，你一开始读也是觉得有些古怪的，但是你很快就适应了，你甚至觉得这个称呼才是适宜的，让你有一种代入感却又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你是如此入戏，以至于在写这篇读后感的时候，你不由自主的用了“你”的人称来叙述。写别的小说的读后感，你是断不会如此的，而《雨》是多么别致，多么独一无二，用“你”似乎也变得合乎情理了。

抒情的悲伤和诡秘的命运细密密地萦绕在《雨》的很多篇章里，除了那篇《小说课》，这一篇是和其它的篇章不大一样的，然而却让你看得津津有味。《小说课》之一的结构极巧，副标题是写作技巧，对应本章内容，但是整篇连贯一气又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首尾呼应，有些环型叙述的意味，让你想起了科塔萨尔的《公园序幕》，又或者是爱伦坡的《猫》，里面的小物件如老虎牙齿和木瓜树顿然又让你回到了《雨》系列作品，不禁凛然又有些会心。《小说课》之二被对于文人的讥讽揶揄让你忍俊不禁，原来作者也有

风趣的一面，甚至有些刻薄呢。你也被《雨》的意境之美惊到了。梦境和现实彼此勾连又模糊不清，虚实交错，亦真亦幻。比如《树顶》那篇，结尾之处那个消失了父亲似乎又归来了。似乎，这就是作者的高明之处，他没有白纸黑字地这么写，就像沈从文在边城的结尾写的：“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是一个留白的结局，这样的结局让人回味。而《雨》里似乎每一篇都没有一个确凿的结局，似乎每一篇都有缺失和断裂，你于是看到每一篇的最后都会恍惚。如果你是雨，如果你是云，如果你是风，如果你是风。你什么也不是，你却看到了所有的风和所有的雨，你看到了科塔萨尔和马尔克斯的痕迹。比之《南方高速》，《雨》多了好些细滑入微又令人惊悚的细节，语言上也是更丰润绮丽。

你花时间去记录下你的惊奇和赞叹，你真诚地相信，时间的河流会证明这是一部经典之作。你希望更多的人的世界里能下一场这样的雨，大雨天上来，来自南方的雨，来自南方的天空。那里湛蓝透蓝的天空下，有一个叫黄锦树的人用他的翻云覆雨手挥洒了一场又一场磅礴清凛，庄周梦蝶的时光之雨。

## 彼“相及”非此“相及”

### ■魏伯河

李秀强先生在《中华读书报》2018年11月21日《国学》版发表《清华简〈楚居〉与“风马牛不相及”之“及”》一文（以下简称“李文”），在提出己见的同时对笔者和李国文先生关于“风马牛不相及”的讨论文章加以评鹭。文章发表后能得到反响，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是作者所期待的，为此笔者特向其致谢。

李文提出的新见是：“解决‘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关键不在‘风’字，而在‘及’字。”此说的确出人意料。他通过征引清华简《楚居》和《诗经·大雅》《国语·晋语四》等书证，说明“及”有“婚配、嫁娶”的引申义。并且以为，“既然明白了‘相及’有‘婚配、交媾’之义，‘风马牛不相及’就容易理解了，其意思也就说‘风马牛’不相婚配或交媾。”进而断言：“以往诸家皆未得‘相及’之隐语义，以致不能真正理解‘风马牛不相及’之确义。”似乎他的这篇文章可以为这一争论做出定论。

“及”字在古代典籍中具有表示男女婚配、嫁娶这一引申义，经李文耙梳而彰显，这是应该肯定的。文章的引人注目之处，是利用了清华简《楚居》里的新材料。其实仅用《诗经》《国语》里面的旧材料，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就此

而言，这则“新材料”的价值其实有限。但若以为用这“新材料”或旧材料便足以解决“风马牛不相及”的老问题，则未必然。盖因既是引申义，必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与对象；超出了其适用范围和对象，甚至以引申义取代本义到处套用，就会出现种种问题。就本话题而论，愚以为该文所征引文献只能证明先秦在涉及先祖或贵族婚配时确有以“相及”作为隐语的语言现象，但套用于“风马牛不相及”并不恰当，因为两者的适用范围和对象不同。

就动物之间“牝牡相诱”（即“风”）这一点来说，人类与马牛是基本相同的。但人类毕竟是最高级的动物，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其婚配、嫁娶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文化内涵。就李文征引的《诗经》两个“及”字的用例来看，当时已经不属于劫掠婚的时代了。至于《国语·晋语四》里所谈，则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男不同姓，其生不善”的道理，并且将其作为礼法规定了。春秋初年，秦晋两国互为婚姻，使“秦晋之好”成为婚姻的美称，更是众所周知的佳话。而马牛之类牲畜则只有交配而无所谓婚姻，并且至今也没有进化。如果径直将表示人类尤其其贵族婚配的“及”字的引申义移用于解读马牛之间的交配，说“相及”就是马牛“不相婚配”云云，无论如何是不相伦类的。

马牛异类之间固然“不相婚配”，其同类之间岂有所谓“婚配”乎？李文征引的所有例证都是表示的“老问题”，而没有一例与马牛或其他动物有关，还不足以说明适用对象的區別吗？

强文认为：“楚王这段话中重点强调的，是距离遥远的空间因素，而并不是马和牛之间的类别不同。”这其实并非笔者的新见，而是古往今来非学者者的共识。如晋杜预注：“楚界犹未至南海，因齐处北海，遂称所近。”牛马风逸，盖未界之微事，故以取喻。”以地理位置而论，说齐处北海（今渤海）是没有问题的；但说楚国处南海，就太夸张了。因为楚国的疆域从来未有越过岭南。楚王这样说，显然是为了使“南北”两个方位形成鲜明对比，极力强调两国相去遥远，连马牛因牝牡相诱导致的走逸之类的小纠纷也不会发生这样一个事实。当代学者在这一问题的理解上也大都一致。如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牛马牝牡相诱而相逐谓之风，风马牛不相交，谓齐楚两地相隔遥远，纵使牛马牝牡相逐，奔逸虽速而远，亦不致互相侵入边界。”王力《古代汉语》：“马牛牝牡相诱也不相及（依孔颖达说）。风，放，指牝牡相诱。这是比喻两国相距甚远，一方向互不相干。”这些意见，李文都有征引，不知何以视若无睹？李文写道：“行文至此，‘风马

牛’为何‘不相及’的缘故，不待辩而明了。马与牛属于不同的种类，故‘不相及’，按生物学说法就是：牛、马彼此之间有‘生殖隔离’。风马牛不相及，意即将发情期的牛马同置于野，公牛与母马或者公马与母牛，牝牡之间亦不相诱，也就不可能相互交配。此比如喻齐、楚两国相隔遥远，互不相干，不致互相侵入边界。”此说颇为牵强，主要是存在着本体和喻体的脱节。作为喻体的马与牛为不同物种，不会牝牡相诱；但作为本体的齐人与楚人虽属同类，却已大兵压境。喻体与本体之间恰成反衬，这样的比喻还有何作用或意义？

从修辞学的角度看楚王这段话，不难发现其主要的修辞方法是夸张而非比喻。其中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夸大：“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极力夸大两国之间的距离遥远；二是夸小：“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极力说明两国过接连马牛因牝牡相诱造成的走逸之类的纠纷也不存在。夸小与夸大紧密联系，其基本点都是两国并不相邻而距离甚远，素无纠纷。至于所要达到的目的，则是指责对方师出无名，而已方承受的是无妄之灾。所以严格讲来，“风马牛不相及”并非比喻，而是举例，因为当时相邻的国家或部落之间因此类问题引起的纠纷常有发生。

## 张昌华先生的一封信

### ■张梦阳

刚刚闻悉：张昌华先生和聂震宁先生等五人在中国编辑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获得“行业影响力杰出人物奖”称号。使我立即想起了张昌华先生1991年2月19日给我的一封信。用挺秀的毛笔字写成，章法有度，很是漂亮：

张梦阳先生：

您好！向您拜个晚年。  
赐予除夕收悉。迟复为歉。尊译作《中国人的气质》，懿翎同志一给我，我即拜读。返宁后，即力荐给总编辑。社里几位领导相传阅，翻了一下，一致认为，此书有价值。但又觉得目下印出，有点不便，建议暂放一放，等等再议。适接您的来函，连嗨，将原作暨还。请查收。

我坚信此书一定在近年内能出版，且会有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倘若此书出版，请赠我一册。欢迎您向我们推荐好作品。

盼常联系。

祝撰安

张昌华 2.19

虽然与昌华先生始终未谋过面，但经常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和关于他的报道。尤其是2015年9月10日文汇报周报上的《杨苡先生》一文，令我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众人一起谈他男女老幼各种作者都熟识时，他夫人冷不丁爆出一句：“老张是男女老少‘通吃’。”把在座的逗乐了，把我也逗乐了。现在重见他27年前的亲笔信，如沐春风。

张昌华先生来信的缘由，是这样的。近四十年前的1979年10月，我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鲁迅研究室工作。翌年初春，奉命跟车到北京大学接王瑶和袁良骏先生出席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筹备会议。车上，老袁向王瑶先生问起史密斯《中国天气》一书，王先生说鲁迅多次希望把全书翻译出来给中国人看看，可至今没有看到译本。我立时记在心中，会一结束，就直奔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查找此书，果然查到了。于是凭着“文革”后拾起的英文，捧着词典“啃”起来，经林非先生鼓励写成《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天气〉》一文，发表于《鲁迅研究资料》第11辑，在鲁迅学界引起广泛注意。

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中国民族性”的重点课题研究，至交张琛先生引荐我参与此课题，准备翻译《中国天气》全书，并请英文专业出身的王丽娟女士合作。开译之后才知此事艰难。史密斯是英国籍的美国传教士，又在英国生活了二十二年，所以这本书中有英国典故，又有美国成语，还有大量的中国典故、俗语，行文又是一百年前的，费解之处甚多。加上作者是外国人，对中国典故的英译不够准确，找到对应的中国经典原文很困难。例如第十五章不讲舒适和方便，引了一句孔夫子的话：“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原文英译有误差，依照英文查找孔子原话就艰难了。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一直无人翻译全书了。但是，既然上马，只得硬着头皮译下去。从《文学遗产》编辑部借来《辞海》也似厚重的《十三经》，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楼鲁迅研究室翻找了两天一夜，从食堂打一顿中午饭吃一天，夜里太困了，就把椅子摆成一排，用两本《辞源》当枕头，稍歇一会儿，醒来再接着翻找，终于查出了孔子的原话。当时真如勘探队员在荒野发现了宝藏一般兴奋。经过一年多奋斗，于1988年译完，经懿翎女士力荐，作家出版社同意出版，还请唐棣先生写了序。但因特殊原因搁浅并未发稿。

经过数年艰辛苦斗，才译出全书，眼看就要问世了，却突然付诸东流，其打击之沉重可想而知。懿翎深为同情，把书稿推荐给张昌华先生，才有了以上的信。看到信，我灰凉的心中，吹来一阵春风，倍感温暖！对一位素不相识的译者，能够认真地写这封感人的信，充分表现了昌华先生崇高的编辑道德与高瞻远瞩的见识。

1995年12月，《中国天气》终于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第一版。之后每隔五六年再版一次，至今已近三十年，连出了五个版本。被学界公认为是数种译本中最好的一本。特别是第五版加入了美国陈达牧师送我的《中国天气》原书的经典图片，印制更加考究。完全验证了昌华先生27年前的预言：“坚信此书一定在近年内能出版，且会有好的社会效益和可观的经济效益。”事实也证明随着出版环境的好转，不自满而勇于自省的中国人也更加虚心倾听这本书对自己的中肯批评，鲁迅先生希望有人译出全书的嘱托，也越来越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了。

27年前的这封信足以证明张昌华先生早就无愧于“行业影响力杰出人物奖”的称号！